



古镇探寻

如今,这枯枝牡丹究竟从何而来?其答案已经不是十分重要。牡丹的那种“竞夸天下无双艳,独立人间第一香”“唯有牡丹真国色,花开时节动京城”,处处表露出“国色天香”的娇美艳丽,才是人们最为关注的。

谷雨时节话牡丹

□卞龙林

非遗年让珠溪古镇越发红火,谷雨前后,古镇陈家大院牡丹成为热门打卡点。这牡丹的热火当与其品种也系枯枝相关。好奇心,驱使人们纷至沓来。

古镇牡丹的原主人姓陈,名恒新。因珠溪古镇建设需要,陈家房舍已改造成古镇文化的代表景点。眼前的牡丹植于前堂院内东西两个花坛。虽说是两株,却因是灌木类,分枝颇多,一米五直径的大花坛被其占得满满。盛开的牡丹,占据偌大的厅堂大院。分枝有从基部根处绽出,有从离根不远处泥土中冒出。嫩枝舒展,老干枯涩,苍鳞虬结,密密匝匝,花香四溢,沁人心脾。浓浓色香,蜂蝶飞舞,一派万紫千红总是春的胜景。

东面花坛粉红色的“玉楼春”,复瓣,花瓣层层叠叠,枝条短促,枝干苍老,黄蕊深藏,始花稍迟,花期稍长。

历史记载,牡丹作为观赏花卉进入殿堂庭院,是从隋炀帝大业元年(605年)开始的。“隋帝辟地二百里为西苑,诏天下进花卉,易州进二十箱牡丹。”这是宋代大学者王应麟的《海山记》所记,牡丹由此从野外进入皇家官苑。

唐代诗人舒元與《牡丹赋序》又记:“天后之乡,西河也,有众香精舍,下有牡丹,其花特异。天后叹上苑之有阙,因命移植焉。由此京国牡丹,日月寔盛。”这“天后”,指的是武则天。原来牡丹出自武则天家乡“西河”。对于伍佑古镇来说,更有意思的是,这“上苑”与西汉司马相如笔下《上林赋》所描绘的“上林苑”是同一皇家园林。镌刻在伍佑石桥上的“司马相如题柱”的联句,说的就是司马相如的故事。新近出版的《伍佑镇志》记载:1963年,在伍佑境内发现的“三羊墩汉墓”出土文物中,有件铜扣彩绘铭漆盘,上面印有“上林”字样。这或许正是伍佑古镇与牡丹之所以结缘的历史原点。

武则天从家乡移植牡丹的史实在二十四史类的典籍中可以找到依据。据《新唐书·高宗纪》:唐显庆五年(660年)二月,唐高宗携武则天从东都洛阳回到“西河”(今山西文水县)。三月初五,“皇后宴亲族邻里于朝堂”。四月,返回洛阳,在东都花园“作八关官”。这是武则天得宠后返回家乡在史书留下记载的唯一。事实上,其时不但东都洛阳牡丹兴盛,长安京城赏玩牡丹“家家习为俗,人人迷不悟”。《西阳杂俎》《唐两京城坊考》,有长安朱雀街开花坊“尚书左仆射令狐楚宅”“牡丹最盛”的记载。时任户部尚书令狐楚与牡丹结缘。后来,被贬任东都

西面花坛酱红色的“紫袍”,单瓣,花瓣飘逸洒脱,枝节稍长,枝干平滑,黄蕊外露,始花稍早,花期较短。与便仓枯枝牡丹相比,虽说都是“红”“白”两色,“红者寄丹心,白者寄洁志”。这“红”的“紫袍”没什么两样,而那“白”的呈粉红色的“玉楼春”与“赵粉”区别十分明显。便仓园的那品种是单瓣,较为飘逸;古镇的这“玉楼春”是复瓣,较为妩媚。这或许也是伍佑陈氏牡丹能够在新时代焕发生机,成为热门打卡地的另一原因。当然,“玉楼春”又是词牌名,显然为珠溪牡丹加分不少。《玉楼春》作为词牌名,最早出现在五代十国时期《花间集》,南唐词人顾夐有“月照玉楼春漏促”“柳映玉楼春日晚”的词句,因而得名。“南宋四大家”之一的范成大《玉楼春·牡丹》词,“满蹊桃李不能言,分付仙家君莫惜。”更让“玉楼春”

留守,从而引起令狐楚《赴东都别牡丹》之伤感:“十年不见小庭花,紫萼临开又别家。上马出门回首望,何时更得到京华。”唐代诗豪刘禹锡为此唱和《和令狐相公别牡丹》:“莫道两京非远别,春明门外即天涯。”

一句“春明门外即天涯”,借用牡丹之缘道出了刘禹锡为令狐楚鸣不平的无尽感慨。进而联想到,杭州西泠印社大家黄易也曾以“春明门外即天涯”的诗画,表达同样的离别之情。乾隆四十二年九月,伍佑场署幕僚黄易绘《春明门外图》册页,并以“春明门外即天涯”辘轳体诗书赠明春岩。明春岩,即乾隆年间伍佑场署大使姚明新。“春明门外即天涯,一路垂杨不见花。铃铎五更残梦破,关心直到玉钩斜。”后来,这一诗画作品又于乾隆五十五年(1790年),辗转到了与黄易有“素心之交”的仇梦岩手中。仇梦岩欣然再以辘轳体诗题跋于册页:“……无端聚散总堪嗟,此别为君补白华。归后定知相忆处,春明门外即天涯。”“春明门外即天涯”,记录了黄易、姚明新、仇梦岩客居珠溪,后又天各一方牵挂思念的人文佳话。

宋神宗元丰年间,北宋秀才高承的《事物纪原·牡丹》:北宋冬月游后苑,花俱开,而牡丹独迟,遂贬于洛阳。这在宋徽宗宣和三年(1121年)进士计有功的《唐诗纪事·武后》记载得稍有详细:“天授二年(691年)腊,卿相欲诈称花发,请幸上苑,有所谋也。许之,寻疑有异图,乃遣使宣诏云:‘明朝游上苑,火速报春知。花须连夜发,莫待晓风吹。’于是凌晨名花布苑,群臣咸服其异。”原本寒冬万物凋零却百花盛开,俨然春色满园春意盎然。

身价倍增。但不管怎么说,“赵粉”也好,“玉楼春”也好,它们的“国色朝酣酒,天香夜染衣”风格是一致的。

关注陈氏这两株牡丹,追寻陈氏牡丹来历,还是二十多年前的事。当年,笔者负责集镇建设相关工作,希望寻到证明古镇历史的活化石。从古树名木入手,这两株枯枝牡丹进入视线。除此,还有铁绳桥南的皂角树、串场河西的枸骨树、东圈门和迎仙巷的香樟树,那迎仙巷杨氏家祠的牡丹,与陈家大院的牡丹有点殊途同归。如此种种,当数这陈家牡丹更特别,枯枝是其一,相传有几百年历史,这是其二。据陈氏分家书所记,院内“花厅别致”,以及“同居七世”的记载,反映了这牡丹为陈家世代相传。分家书署时为民国21年(1932年),至今又过了近百年。据此,牡丹相传有几百年的历史是可信的。

到了明熹宗天启七年(1627年)冯梦龙笔下《灌园叟晚逢仙女》,不但记录了武则天圣旨诗《腊日宣诏幸上苑》,更添加了“牡丹抗旨”和“火烤牡丹”情节。“满园青翠紫目,红紫迎人”,唯独牡丹不开。武则天怎不气愤万分,即刻吩咐太监:“将各处牡丹,连根掘起,多架柴炭,立时烧毁。”转眼间,上林苑牡丹枝梗被炙枯一半。到了清朝,时任国子监司业的彭定求等人于康熙二十八年(1689年),奉命扬州书局校订《全唐诗》,《腊日宣诏幸上苑》收录刊刻其中。虽然按语说“此皆妖妄,不足信也”,鉴于《全唐诗》在中华文化宝库中地位,“不足信”,也得信。“武则天怒贬牡丹花”以及“枯枝牡丹”的神奇,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故事而广为流传。

笔者收有一册清初张潮编选的《虞初新志》(其中,还载有盐城宋曹所著的《义猴传》),王暉的《看花述异记》收录其中。这《看花述异记》记的是王暉于康熙七年(1668年)三月在杭州沈氏花园梦中奇遇。王暉酒后静夜独坐,梦入虚幻仙境,“不复知身在人世”。园内“清溪夹岸,茂林蓊郁”“烟雾溟溟,芳菲满目,人间四季花,同时开放略尽”。在南岳魏夫人侍女“花姑”黄令征引导下,王暉梦见牡丹花师洛人朱仲儒。关于花师朱仲儒,柳宗元的《龙城录》是这样记载的:“洛人宋单父,字仲孺,能诗,善种植之术。凡牡丹花变易千种,红白斗色,人不能知其术。”唐玄宗知道洛阳有一奇人,便慕名请他到骊山栽植牡丹。宋单父在骊山栽了上万株牡丹,形态颜色各不相同,被尊为一代“花师”,赐赏黄金千余两。



三

牡丹原产于中国,中华栽培牡丹的历史至少有3000年。甘肃武威旱滩坡古墓发现的医药汉简,上有牡丹治疗血瘀病的记载,反映了我们祖先早就认识到牡丹的根有活血调经功效。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就牡丹花名的来历有这样说明:“牡丹以色丹者为上,虽结子而根上生苗,故谓之牡丹。”意思是,牡丹既可以通过种子进行繁殖,也可以通过根进行无性繁殖,谓之“牡”,牡丹的花色红者为上品,谓之“丹”。又传,公元22年,汉光武帝刘秀起兵讨伐王莽。刘秀遭王莽追杀,曾藏身于弥陀寺花丛中,得以保命。刘秀遂在弥陀寺壁上题诗一首:“萧王避难过荒庄,井庙俱无甚凄凉。惟有牡丹花数株,忠心不改向君王。”弥陀寺由此更名为牡丹寺。

关于牡丹的栽培,最神奇的莫过于八仙过海中的韩湘子。韩湘,韩愈侄孙,唐穆宗长庆三年(823年)进士,官至大理寺丞。据《青瑛高议》前集卷九《韩湘子》所载,八仙之一的韩湘子,“巡酌间”即可育出“岩花二朵,类似之牡丹,差大而艳美,叶干翠软”。这故事还记载在官方《新唐书·宰相世系表》中,更提高了故事的真实性和权威性。当然,细细品读史料经典,无论是宋代王辟之的《澠水燕谈录》,还是清代阮葵生的《茶余客话》、夏荃的《退庵笔记》,那书中记载的“吕夷简,天圣初任,尝于院后植牡丹一株”,范仲淹的“阳和不择地,海角亦逢春。忆得上林色,相看如故人”流传甚广的诗句,都流露出一种观点:世间所谓枯枝牡丹,“云是宋物,或即二公(吕文靖、范文正)所遗,未可知也。”

如今,这枯枝牡丹究竟从何而来?其答案已经不是十分重要。牡丹的那种“竞夸天下无双艳,独立人间第一香”“唯有牡丹真国色,花开时节动京城”,处处表露出“国色天香”的娇美艳丽,才是人们最为关注的。

人们爱牡丹、赏牡丹、赋牡丹,形成了繁盛的中华牡丹文化现象。牡丹给予国人、赋予古镇美轮美奂、如梦如幻的境地。

